

高岗传

戴茂林 邵晓光 著

历史与纪实
中国出版集团

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

“这是‘文革’期间唯一一部，敢于问世的长篇传记，被当时有识者‘红卫兵’‘红卫兵’等‘左派’作为‘毒草’而加以批判和销毁了。”

1958年，高岗被平反后，高岗传记出版，为高岗正名。但此书在“文革”期间，被作为“毒草”而加以批判和销毁了。此书在“文革”期间，被作为“毒草”而加以批判和销毁了。此书在“文革”期间，被作为“毒草”而加以批判和销毁了。

（注：《高岗传记》一书，由“文革”期间出版）

前言

高岗是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为他做传，有三难：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历时15年，写出了国内首部高岗传——

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克服“三难”，写出国内第一部《高岗传》

高岗，这位中共党史上的特殊人物，因其人生经历传奇、曲折复杂而始终吸引着史学家和公众的眼球。他曾被称为“西北王”、“东北王”，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六位国家副主席之一；他也是党内第一个以“反党联盟”罪名被开除出党，最终自杀身亡的国家领导人。

多年来学者们对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在逐渐深入。但是，由于相关资料的收集难度很大，更由于高岗及“高饶事件”如何评价极其复杂，所以虽经学者们的努力，在高岗及“高饶事件”的研究中有了一些论文及著述，但是，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局部的、个案的、片段的，甚至有些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系统研究、客观阐述高岗及高饶问题的专著在此之前仍是空白。

近日，由戴茂林、赵晓光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岗传》填补了研究空白。这部书既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同时也是党史人物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开辟草莱的成功之作。

这部传记洋洋50余万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扎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运用现代史学研究的方法，系统客观地记述了高岗的传奇人生。作者将高岗49年的人生历程分三个时期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崛起于西北、闪烁在东北、骤然陨落在红墙内。

高岗出生在陕北横山县，1926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追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搞兵运、建游击队、创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谢相继牺牲以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高岗逐渐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三届边区参议会会议长等，被称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领袖”。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来到东北。刚刚40岁的高岗担任了北满军区司令，成功进行了根据地的创建和剿匪，打开了东北工作的新局面。半年后，他就任东北局副书记，在黑土地上掀起了土改的暴风骤雨。在林彪、罗荣桓率军入关后，他主政东北，领导恢复东北经济建设，率先开展“三反”运动，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人称“东北王”。同时，他还当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并出席开国大典。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作为战争前沿的东北地区的首脑，他成为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后勤官”，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政府授给他的勋章时曾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即高岗）”。

研究高岗，绕不开“高饶事件”，也因为“高饶事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高岗研究的基础资料的收集查阅变得很困难。作者在后记中也感叹说：“为高岗做传，是件难事。收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正因为有这“三难”，作者的写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作者走访了许多当事人、知情者、老同志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如高岗家乡高家沟村70岁以上的老人、高岗就读过的中学的校友、长期与他共事的战友及同志，以及高岗妻子及亲属、高岗的秘书等等；参考的书目多达近百种，参考的资料既有相关人员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档案资料，也有专家的研究著述、报刊资料和访谈材料，考察的足迹遍布西北、东北和北京。用功之深，可以管窥。可以说，没有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没有作者的艰辛劳动，这部著作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用最新史料解开一些历史疑云

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特别是由于作者史料工作扎实有力，因而在解开一些历史疑云和有争议问题的研究上，作者就能游刃有余，说服有力了。

如“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高岗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逃脱”。真相如何呢？作者在横山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保存的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的回忆资料里，发现了高岗的“踪迹”。1932年上半年，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连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攻打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那么，高岗撤出战斗（即所谓“逃脱”）后干了什么呢？资料记录高岗带领19个撤出战斗的人在找大部队，途中碰到了九支队的高朗亭部，高岗动员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于是两路人马合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从临镇以南向盘克塬方向一边与追击的敌军作战一边找刘志丹去了。

再如，1949年6月至7月高岗同刘少奇、王稼祥出访苏联，围绕着高岗的这次苏联之行，后来产生了不少“故事”：有人说高岗挟洋自重，讨好苏联，斯大林也特别欣赏高岗，把他特殊化；有人说高岗向斯大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把国土拱手让给外人；也有人说高岗在苏联公开顶撞刘少奇，刘少奇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才将高岗提前召回国。而这些“故事”在坊间广为流传。那么作者如何看待、评述上述这些“故事”呢？作者据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作者，俄罗斯历史学家、现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A·M·列多夫斯基在书中公布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的六份文件，结合苏方公布的材料和我国的有关文献，清晰解答了有关“故事”真相。这次苏联之行，由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所以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冠以“东北商务代表团”的名义（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贷款协议，高岗出访苏联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而即将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尚有一系列重要事宜需要高岗回来协商时，中共中央决定高岗先期回国，刘少奇继续留在苏联商谈两党之间的其他问题。按照事先的商定，在高岗回国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东北商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的报道。报道中说：“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权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东北人民政府商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达成通商协定》为题，也做了报道：“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日前已从东北到达莫斯科，举行了有关通商问题的谈判。由于顺利商谈的结果，获得了东北与苏联之间相互交换商品的协定。……代表团已于7月30日从莫斯科动身返国。”高岗的这次出访只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负责人是刘少奇，可最后在媒体上露面的确实是高岗。不过，此时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因为高岗有多么特殊。当时以高岗的名义发布消息完全是因为中苏两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结果。

“高饶事件”有极深刻的历史教训，即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如何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如何评价围绕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视历史。

《高岗传》的写作，必然要谈“高饶事件”。学界普遍认为“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20世纪80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对于高岗及“高饶事件”的评价，过去国内的出版物多是一边倒的批判。只有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对“高饶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读。

读《高岗传》可以发现，作者是把传主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时期，从而把一个在黄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闪烁，又在红墙内骤然陨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做了全景描述。对这一时期围绕着高岗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运用新发掘的资料重新做了系统的考证和中肯的评述。作者通过近年来披露的新史料，结合作者的研究和访谈，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

从作者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即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无论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指桑骂槐”，还是饶漱石“震动”组织部，其矛头都是指向刘少奇的。这两次会议通常被学者视为“高饶事件”的起点。然而，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发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双方接连在富农问题、互助合作问题、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在争论过程中基本上是赞成高岗的意见的。所以高岗在东北局内部也说了一些贬低刘少奇的话。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此时的高岗同时担任着三个“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之后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

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又把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更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会下鼓动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责刘少奇的意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财经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强调了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既是对薄一波等的批评，也是对高岗的警告。可是，高岗不仅没有重视党内的统一领导问题，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结局。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就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引人入胜，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传记，很难摆脱板着面孔述说、流水账式叙述的窠臼。然而，此书不然。翻开这部传记，“引子”从一个老人的寿宴说起将读者带入历史，让你欲知详情；文采飞扬的叙述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高岗一生的传奇经历以及引发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让你欲知究竟；几十幅珍贵照片让你仿佛回到那逝去的历史时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

创新。不仅娴熟地运用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言必有据，史论结合，而且还注意吸收当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更注重史料运用，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引导读者站在历史的宏观大背景下诠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如此引人入胜，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作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高岗传》责编）

一 童年与求学

概述

高岗是个人物，并且后来成了一个很大的人物。

但大人物的童年也不会与其他的孩子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当一个普通的孩童成为一个不普通的大人物之后，别人仍然能用普通人的眼光对其进行评价，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1941 年高岗连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解放日报》在介绍参议员高岗时的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顽皮的家伙。”

1 讨饭娃娃孩子王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1905 年 10 月 25 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当时属米脂县）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

横山县位于陕西省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无定河上游，东邻米脂县，南靠子长县，西连靖边县，北依榆林市，西北与内蒙古乌审旗接壤，东南同子洲县毗邻。

横山县属于风沙高原区和黄土丘陵区，境内西南部有连绵起伏、东西走向的横山山脉，故取名“横山”。

横山县原名怀远县。清雍正九年（1731）始设县制，民国三年（1914）改称横山县，隶属陕西省国民政府榆林道管辖。全县总面积4084平方公里，明长城从境内穿过，有“陕西省北大门”之称。为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联系的交通要道，也是历来兵家争夺的军事要地，自古即称“北地边障”。

与中国大多数贫穷地区一样，横山人民也具有朴实、勤劳的美德和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笔者在横山县调查时发现，横山县的老百姓在论及历史时最愿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本书的传主高岗，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农民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是米脂人，米脂人自有米脂人的特点。流传甚广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即指米脂的女人长得漂亮，绥德的男人威武健壮。但出人意料的是，盛产漂亮婆姨的米脂却出了个威震华夏的农民英雄李自成。

李自成1606年生于米脂县怀远堡李继迁寨。明代以前横山未设县，怀远堡属米脂县管辖，所以李自成原是米脂人。清雍正九年（1731）将怀远堡设为怀远县，民国三年（1914）怀远县又改称横山县，因此李自成就成了横山县人。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怀远堡虽然改为了横山县，但在横山县境内，插有一条弯曲的走廊地带，包括李继迁寨在内的几个村镇仍归米脂县管辖。这一带民国初年叫米脂西北上区，土地革命时期一度为米西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叫李先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才划归横山县。由此看来，李自成既是米脂人也是横山人，或者说，李自成原是米脂人，现为横山人。

高岗的家乡与李自成的出生地相距很近，高家沟村所在的武镇乡与李继迁寨一样，当年也属于米脂县管辖的走廊地带。

中国人相信风水，善良的百姓们多不怀疑名人必定出自于福地。也不知是先天的福气还是后天的栽培，吸引大批游客的名人故居还真的多在山清水秀之地，但高岗的故居高家沟村却丝毫不见灵气。

高家沟村背靠山皇庙山，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叫背湾沟）从村旁蜿蜒流过。虽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看到当年高家沟村的风貌，但笔者1998年来到高家沟村时，村中尚无公路，百十户人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毛驴车。一阵阵西北风掠过裸露的山皇庙山，将带沙的黄土撒满高家沟村的沟沟坎坎，并穿过带孔的窗纸飘落在窑洞的炕上和地下。

据《高氏宗谱》记载，高岗所在的高氏家族是高家沟村的老户，乾隆十二年（1747）高氏祖先就居住在这里。

高岗始祖高锐，人称“高百户”，当年在高家沟一带小有名气。但到高岗出生时，高家沟村仅有二三十户人家，村中只有高、白两姓，多是穷人。

高岗的祖父高万智一生务农，有三子。老大高仲来，老二高仲魁，老三高仲发。

高仲来即是高岗的父亲。他虽然继承父业以种地为主，但农闲时经常赶着毛驴贩盐倒酒，还当过驴伕子（贩驴），在当地也算一位比较活泛的人物。

高岗的母亲杨氏，农家妇女，生育两男两女。长子高崇义，长女乳名长俊，次子高崇德即高岗，小女高崇礼。

两男两女，六口之家，和谐年代，定会兴旺。但在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那个年代，杨氏在高岗 7 岁那年即因贫病交加而中年早逝。高岗的姐姐 15 岁嫁给了同村的农民，妹妹则在 6 岁那年因生活所迫，以换回六吊钱的代价嫁给一农民当了童养媳。

高岗的生母病逝后高仲来娶农家女常氏为妻，生有一子。但这个给家庭带来了新欢乐的孩子两岁时不幸夭折，常氏也因忧愁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中年即去世。

横山是个穷县，高家沟更是这个穷县中的穷村。当年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农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条路：逃荒、寻死、坐监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烂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盖，天阴下雨毛朝外。

湿了有心晒一晒，身上无衣不等待。

住的烂窑黑窟窿，黄蒿柏子绑成门。

窗子塞些糜草捆，风吹雨打难藏身。

风扫院、月点灯，端起饭碗照影影。

躺在炕上望星星，抱住膀子等天明。

铺没铺、盖没盖，当炕摞条毛口袋，又顶铺来又顶盖。

穿没穿、戴没戴，皮袄冬夏离不开，虱子咬起墙头晒。

农民苦、农民穷，穷得要甚没有甚。

三个囤囤两个空，一个不空放些屋阶尘。

三个箱箱两个空，一个不空放些苦菜根。

三个缸缸两个空，一个不空放根驴粪棍。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时常要靠讨饭维持生计，这是童年的高岗无法摆脱的命运。但高岗出生时就虎头虎脑，又排行老二，故取名二愣。虽然家境贫寒，但二愣却越长体魄越强壮，在骨瘦如柴的孩子们中可以算做人高马大，因7岁那年患天花病而造就的一张麻子脸方方正正，很有几分英气。加之自幼就养成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使高岗很自然地成了高家沟村讨饭娃娃的头头，经常是由他率领着孩子们去讨饭，孩子们讨来的饭再交由他来分配。

高岗的叔伯侄儿高生埔，曾于1998年在高家沟村向笔者讲述了他听老人们叙述的往事：

高岗小时很调皮，也很勇敢，娃娃们都拥戴他为头头。他经常领着孩子们去讨饭，也经常和别村的孩子们打架。有时候，他坐在炕上，装做山大王，让娃娃们给他磕头。

1954年4月，高岗在被管教期间撰写的《我的反省》中曾经有童年的回忆，说：

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村里的大财主武世晨，仗着儿子在外当军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次，武世晨的儿子回乡省亲，头戴金边帽，腰挎东洋刀，骑着高头大马，护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暗暗下决心，长大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也要做这样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转引自赵家梁、张晓霁著：《半截墓

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第267—268页。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后文中引自《我的反省》的材料，皆出自此书。

我们不应该推测当年的“孩子王”和后来的“西北王”乃至再后来的“东北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高岗后来成名也不是因为他小时候敢于打架。但是，淳厚的黄土高坡、凛冽的西北寒风、苦难的讨饭童年和孩子王的生活经历，必然对高岗后来的曲折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至于想做个“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物，也无可非议，由报仇而革命的人在当年并非少数。

2 10岁读书，16岁结婚

横山地倚边塞长城，自古兵燹频仍，民不聊生，致使人们重武功而轻文治，读书习文者寥若晨星。据旧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县境内有文进士3人、举人10人、贡生12人、武进士5人、武举22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有拔贡2人、例贡5人、贡员113人。民国初年，全县各类学校毕业生亦仅有大学生4人（含留日学生1人）、省高等学堂学生3人、师范生5人、军校生6人、中学生27人。

生长在这样一个“风气窒塞、人文学风向无可传”的偏僻之地，高岗的命运似乎很难与黄土高坡之外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龙镇小学旧址

然而，当过驴伥子的高仲来终究比刨黄土的乡亲们来得精明。1915年冬，高岗10岁时，他把高岗送到了武家坡读私塾。1918年，高仲来又作出了一个改变高岗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让高岗兄弟俩到龙镇小学读书。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叫赵相林，高岗的官名高崇德及哥哥高崇义的名字都是他们到龙镇小学后其父请赵相林给起的。据高岗的同族侄儿高生买介绍，高岗小时虽然顽皮，但头脑还是比较聪明，比他哥哥高崇义学习要好。

1998年9月，笔者在高家沟村邀请几位70至80岁的老人召开了一个了解高岗情况的座谈会，听到了一件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有些联系的往事：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老师是龙镇赵家庄的赵相林。赵先生多次批评高岗调皮，说他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结果，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当了“东北王”，而赵相林却因开小煤窑赔了钱而陷于窘境。于是，新中国成立初赵相林跑到了东北请求高岗给予帮助。高岗当时没有答应赵的请求，但当赵回来后，高岗托人在事先没有告知赵的情况下，给赵送去了四万斤小米。

本书没有必要评价高岗送赵老师小米一事的其他含义，但如果此事属实，至少说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也并非循规蹈矩的读书郎，否则不会三番五次地遭到赵老师的批评。

由讨饭娃娃到读书郎，虽然高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十几岁的高岗仍然是个孩子。然而，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也要肩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1921年，年仅16岁的高岗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高岗的原配夫人杨芝芳，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革命前有土地 22 垧、土窑 5 个，这是两家的。土地分开种，有毛驴一个，常是不够吃穿。1948 年 5 月，我大哥家饿死几口人。

生长在那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村，杨芝芳没能避免被缠足的命运，也不会有去学堂读书的权利。与高岗完婚后，高岗仍去龙镇小学读书，杨芝芳则在高家承担起了家务。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高岗没有投身革命，杨芝芳也许很难走出横山县；如果高岗没有在投身革命后又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杨芝芳也许不会在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被迫离开高岗；如果……

1930 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岗回到了高家沟村。高岗回家后，帮助丧妻的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一道，抱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高家沟村。

1999 年 1 月 5 日，94 岁高龄的杨芝芳老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开头的一段讲述了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些情况：

我叫杨芝芳，陕北米脂人，是高岗的前妻，15 岁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的。1926 年高岗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创建陕甘宁边区。受他们的影响，我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于 1930 年也参加了革命。起初，我当红军的交通员，送情报。尽管我的身体条件不好（裹脚），但是，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1935 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 1935 年 7 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 1935 年 4 月至 1938 年 3 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 年 4 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 年 1 月 27 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 95 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 1982 年口述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 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 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的副主任。1946 年 11 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 月 7 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 1947 年 3 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一

切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月2日过了黄河，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延安光复后，保育院又回到了延安。我们这次历时近20个月、行程1000多里，实现了孩子们安全转移。当许多家长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探望自己的子女，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健壮时，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说：‘想不到孩子长得这么好呀！’”

杨芝芳是新中国保育事业的奠基人。她从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成立到新中国诞生，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4年春调到东北，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机关幼儿园主任。1955年西北保育院改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她又回到西安任保育院院长，一直到1978年离职休养。

1986年，组织上安排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到北京市海淀区老干局干休所安度晚年。2001年5月1日，老人家在北京304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

杨芝芳与高岗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名“海潮”，生于高家沟村，三岁时因病死于延安。二儿子名高毅，小名“老虎”，1930年生于高家沟村。1939年，高毅随同周恩来去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学

习七年。1947 年，随同王稼祥等由苏联回到哈尔滨，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1948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留学，高毅同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21 人一道，再次赴苏学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建筑。1952 年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次年，与宋丽达结婚。1960 年，为照顾老母，举家由哈尔滨迁到西安，先在四〇三厂工作，后因“清理阶级队伍”，去了咸阳纺织器材厂。1979 年，经王震同志批示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直到退休。

3 组织“一高”学潮

在清代和民国初，横山县官办学堂很少。光绪三十一年（1905）维新变法，学部颁发兴学章程，通令各县成立学堂，县令章春芳才下令将乾隆十四年（1749）成立的岩绿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1915），高等小学堂又奉令改为横山，后又改称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一高”），成为横山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官办学校。

青年时期的高岗

所谓的高等小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一般学制三年，招收小学毕业生。高岗是 1922 年离开龙镇小学进入“一高”读书的。当时的“一高”在校长曹思温的苦心经营下，已经成为在陕西省小有名气的学校。学校不惜重金从北京、西安、绥德等地延聘名师任教。从北京请来的教师陈建晨（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的年薪就高达 400 银元。

“一高”校舍是在 1947 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在战火中被焚毁的。校舍遗址距现在的横山县城有十几里路。

1998年9月24日，我们在横山县史志办赵庆隆先生的引导下，来到了位于半山腰的“一高”旧址。

映入我们眼帘的只有几处残垣断壁和满山坡的庄稼。历时200余年的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现仅存五孔残窑。昔日人声鼎沸的操场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我们只能从新编县志中窥见当年学校的概貌：

民国七年（1918），县长张文丞因学款支绌变卖冯君聘等膏火学田数处，得银洋三千余元，除以二千元作基金洋外，以千余元在原学堂的基础上增修校长和教员室、益智图书馆、贮藏室石窑五孔，并购置图书、教科书及理科标本，学校设备渐趋完善，学生也发展到一百五十余名，教师七名。民国十年（1921）后，县长刘治堂重视人才，热心教育，设法给学校增筹基金，添聘教师。并在窑前东西两边各新建宿舍五间，在西院修通用大教室五楹（三大间），学生宿舍两排各五间。对校长室东侧的操场也进行了扩建。《横山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503页。

高岗入“一高”时已经17岁，身高已达18米，

加之生性好动，善于结交朋友，爱打抱不平，很快就成为学生们所瞩目的人物。1922年秋天，在榆林举行了有陕北23个县参加的学生运动会，横山“一高”在这次运动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声名大振。身高力壮的高岗也在运动会上又跑又跳，大出风头。

现代学堂往往成为新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这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高岗入“一高”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潮正通过大中城市向城镇扩散。特别是到了1925年，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高潮也波及了偏远的横山，宣传新思潮的各种书刊在学生们中广泛流传。

1925 年入“一高”读书的谷奇峰（1981 年离休前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竟然在历经战乱和内乱后，还神奇地保留着他 1925 年至 1928 年在“一高”时读过的部分书籍，为我们了解当年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在“一高”的传播情况，留下了真实的证据。

谷奇峰保存的在“一高”时读过的书有下列七种：

《社会进化论》（油印本），昆山著

《新社会观》，课外读物

《社会主义讲授大纲》，萧楚女著，课外读物

《政治学概论》，恽代英著，课外读物

《工人与政党》（油印本）

《政治生活》杂志（77、80、81 期）

《向导周报》（160、161 期）《谷奇峰回忆横山县早期革命斗争》（1983 年），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这些书刊都是当年流传甚广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在当时的“一高”可以公开地阅读。虽然没有见到高岗如何学习这些书刊的直接材料，但作为“一高”学生领袖之一的高岗必然受到这些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则是可以推论的。

例证就是高岗在 1925 年春天爆发的“一高”学潮中的表现。

关于“一高”学潮爆发的原因、经过与意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是这样论述的：

1925年3月，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简称横山“一高”）学生曹动之、高岗等人受绥德、榆林等地共产党员活动的影响，积极组织起来，开展罢课斗争，反对奴化教育，并与王东皋、石作琦、王怀信等组织建立学生自治会，高岗、曹动之先后任学生会主席。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惊恐，于是开除了曹动之、高岗等五个带头人的学籍，又给其他参与者以罚款处分。对此，全校学生极为不满，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整队到县政府门前请愿。结果遭到县知事刘治堂和反动军警的镇压，关押了学生王怀信、石作琦。第二天，学生纷纷离校罢课，并派曹动之、高岗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后经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从中斡旋，横山县当局释放了被押学生，免除了对学生的罚款，杜先生将被开除的五名学生收入榆中就读。这便是震动陕北的横山“一高”学潮。中共横山县委组织部、中共横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横山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8页。

“一高”学潮从小学闹到中学，从横山闹到榆林，其反抗旧思想、旧制度的革命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范畴，在当时的陕北高原震动很大。《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就称其为“横山革命的先声”。

高岗在“一高”学潮中发挥了作用，得到了锻炼，并因此进入了著名的榆林中学读书，这是年轻的高岗所没有想到的。但恐怕高岗更没有想到而且是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件事，也是在“一高”学潮时发生的。

这就是他在“一高”学潮期间结识了刘志丹。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虽然刘志丹仅比高岗大两岁，但与出身贫寒的高岗不同，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出生

于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刘志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2 年就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中学读书。而且胸怀大志、聪颖勤奋的刘志丹很快就在榆林中学崭露头角，于 1924 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首届会长了。

横山“一高”学潮之所以能够胜利，是与榆中校长杜斌丞先生的从中斡旋分不开的。高岗与曹动之等五人徒步前往榆林镇道署申诉，也是在杜斌丞以及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高岗等人来到榆林后，首先受到了榆中校长杜斌丞的亲切接见，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与高岗等横山“一高”的学生代表也进行了深入交谈。然后，在杜斌丞和刘志丹的努力下，召开了榆林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联系会，高岗等在会上报告了学潮的起因与经过，与会者也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一高”学生的合理要求。在学生义愤填膺，民怨渐渐上升的巨大压力下，又由社会名望很高的杜斌丞亲自出面斡旋，才迫使横山县当局做出让步，刘志丹使学潮取得了胜利。

我们虽然没有刘志丹与高岗首次相见的详细材料，但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见面会谈，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还是自然的。

1943 年 4 月，高岗在刘志丹逝世七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和志丹同志前后共患难十年。

刘志丹是 1936 年 4 月 14 日在东征战役中牺牲的。二人“患难十年”的起点，就应当是这次学潮引发的相见。

4 就读榆林中学

高岗是在“一高”学潮后，于 1925 年秋入榆林中学读书的。

榆林城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坡的交汇处，居陕西省的最北部。这里曾是榆林道台衙门和陕北镇守使所在地，管辖着榆林、延安两府 23 个县的地界，是北通内蒙古，东至山西、直隶（河北省的旧称）的交通要道，也是陕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黄土高原雄浑壮美，毛乌素沙漠浩瀚无垠。在一望无尽的浩瀚沙漠和波浪起伏的黄土丘陵之间，耸立着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也可谓陕北高原上的一个奇观。

榆林中学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它的前身是清朝末年（1903）创办的榆阳中学堂。1905 年，清廷传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鼓励地方办学。榆林府借机将榆阳中学堂办学经费分摊给榆林、神木、府谷、怀远、葭州（今佳县）五县，榆阳中学堂也因此改名为五县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原榆林府官办的五县中学堂改归陕北道立，陕北道尹公署遂将五县中学堂改为陕北殖边学校，面向陕北 23 县招生。1913 年，陕北道改为榆林道，陕北殖边学校也随之改称榆林殖边学校。1915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实施教育整顿，“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强调地方民众的办学责任。

榆林中学旧址榆林道尹吴敬之遂将道立陕北中学校改为陕北 23 县联立，录取陕北各县高小毕业生，办学经费由陕北 23 县共担，校名也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

1917 年，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杜斌丞来到榆林中学，开创了榆林中学发展的新时期。

杜斌丞原名丕功，1888 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1907 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 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 年夏毕业后，杜斌丞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来到榆林中学。他先任历史、国文教员，后为教务主任，1918 年 8 月就任校长。

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主持学校工作后，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学生“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性格，立志要把榆林中学办成培养振兴中华有用人才的摇篮。他大胆地把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运用到榆林中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在校内树立起了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崭新旗帜。

杜斌丞深知要想办好学，首先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1923年春，他聘请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来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来校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短时间内就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和校内的学术空气，给榆林中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魏野畴于当年秋冬之际被迫离开榆林中学后，杜斌丞又亲自去北京，在蔡元培、李大钊、林语堂等人的帮助下，聘请了李子洲和王森然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来榆林中学任教。

1924年5月李子洲去了绥德，王森然也于年末因病返京。杜斌丞再聘高宪斌、呼延震东、曹又参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榆林中学任教。这些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精心培育着榆林中学的莘莘学子，使这所西北高坡上的普通中学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来到这样一所新思潮气息浓郁的陕北名校读书，必然对已经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高岗产生重大影响。高岗也正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情况的可靠材料很少。一些回忆材料只是说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发起的学生运动，并且因此被迫于1926年秋离开榆林中学到伊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

不过，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于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他后来自己写的简历中有记载的。

1998年9月，笔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这所历史悠久的陕西省重点中学，想寻找一些有关高岗在此读书活动的足迹。然而，面对着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校舍，引导我们参观的年轻的副校长也无法描述当年学校的旧貌。翻开为庆祝建校90周年而自编的《榆林中学校史》，在“知名校友”一栏里并没有找到高岗的名字。但在校史陈列室里，我们却在“知名校友”橱窗内见到了一张高岗的照片和一纸《高岗简介》。

当笔者问起为什么在校史中没有的高岗却在陈列室里出现了，这位副校长的回答出人意料：

高岗确实曾在榆中读过书，但他后来犯了错误，在校史中出现不好办。这次在陈列室中出现，也是临时加上去的。因为高岗的儿子高轩前几天到榆林来考察投资，要来榆中看他爸爸当年读书的母校，我们就临时增加了高岗的介绍。

看得出，《高岗简介》确实是临时撰写的。因为高岗离开榆林中学后进入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1927年初创办的，而《高岗简介》中却说，高岗“1926年春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二 跟随刘志丹、谢子长搞兵运

概述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2月5日，六个分区的67名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了六面锦旗，锦旗上分别写着：

“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领袖”、“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此时，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的高岗，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所有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光环，都戴到了高岗的头上。

而在我们将要叙述的年代里，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星辰，应当首推刘志丹和谢子长，之后才是高岗。

1 短暂的军校生涯

高岗的革命生涯，是踏着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尾声开始的。

1926年11月，围困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终于被杨虎城率领的西安军民击溃，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担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主任

史可轩，1890年生于陕西省兴平县，7岁入私塾，14岁上高小，17岁到太原入山西常备军第一营后队七棚当兵。从军期间，因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宣传革命，被捕入狱，在狱中由李岐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夏，史可轩考入太原陆军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学校的学生编成了学生军，史可轩任游击营营长，参加了攻占大同府的战斗。1913年秋，史可轩被陕西省保送到孙中山在日本主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并于次年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同年回国后，史可轩先后在陕西军阀陈树藩部、井勿幕部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史可轩任骑兵营营长进驻北京。在

京期间，史可轩多次与李大钊会谈，开始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1924年底，史可轩被河南军务督办胡笠僧（胡景翼）委任为郑州警备司令，并在郑州结识了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1926年，经王若飞介绍，史可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为了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委派史可轩负责筹建中山军事学校。军校建立后，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军校聘请了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五位苏联顾问任教官，从国民军联军下级军官和进步青年中招收学员。

高岗是1927年2月来到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他在中山军事学校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半年左右，但短短的几个月军校生涯却使高岗的一生发生了重要转变。

中山军事学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开办的，校长及学校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因此，学校的课程除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学员，还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ABC”等党课。中山军事学校还非常注重对学员的实践锻炼，除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外，还规定学员要经常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从事革命实践活动。

中山军事学校的丰富生活使高岗如鱼得水。

身高体壮、生性好动的高岗自幼就喜爱舞枪弄棒，艰苦的军事训练对于高岗而言极易适应；直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更使高岗明白了要想反抗旧制度的统治，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成功的真理。因此，高岗革命热情极其高涨。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常活跃

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贴标语，散传单，秘密运送武器弹药，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6月，镇守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开始在豫陕两省清除共产党人。

史可轩领导的中山军事学校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共产党人云集，是被“清剿”的重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高岗又是学员中的活跃人物，自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6月的一天，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得知敌人要对高岗等几名中共党员下毒手，便及时通知了中共党组织。党组织果断地安排高岗等人星夜离开西安躲避。

于是，高岗于1927年6月辗转数日回到了老家横山县。

2 发动农民抗捐抗租

在高岗回到横山之前的1927年5月，中共横山第一个党支部已经在“一高”诞生，支部书记是曹亚华。

曹亚华又名曹培杰，与高岗同龄，横山响水堡人。1925年，曹亚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读书，1926年夏，因参加北京三一八爱国运动被驱逐，返回横山，到“一高”任教。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陕甘区目前工作计划》，决定今后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要首先集中在陕西，“在陕北目前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这个工作计划还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要求党要深入农村，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党支部。会后，已经在绥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曹亚华，按照中共

榆林地委的指示，开始在横山等地建立党的支部。同年5月，曹亚华与1925年在山西新民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彝民老师一道，发展了“一高”教师钱德明加入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横山“一高”支部，由曹亚华任书记，钱德明任组织干事，李彝民任宣传干事，隶属中共榆林地委领导。

在曹亚华等人的积极工作下，到1927年7月，横山已有共产党员7名、共青团员9名。党组织还帮助建立了国民党横山县党部，曹亚华任执行委员。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榆林地委和绥德地委相继遭到了破坏，横山党组织也处于瘫痪状态。高岗就是在这种革命低潮的不利形势下回到横山的。回到家乡后，他主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横山党的组织重新活跃起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是这样记述高岗回横山后的革命活动的：

他与曹亚华等人在响水堡、怀远堡举办了“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在农村中宣讲农民运动，传播革命思想，成立了农民协会，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并积极加入党团组织。于是，横山党的组织又重新活跃起来，党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向了农村。中共横山县委组织部、中共横山县委党史研究室、横山县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横山县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3页。

当年在“一高”读书的高增培（离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常委），补充回忆了高岗回来后的一些细节：

1927年他和谷占锋一起从西安军校回来。是年秋谷占锋和高岗就给横山“一高”教唱《国际歌》，高岗还搞了个县文化馆，以后就

不知去向了。高增培：《有关高岗的一些情况》（1985年3月9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可能到“一高”教唱过《国际歌》和办过文化馆（还有的知情者回忆说是办了个民众教育馆），但当时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农村。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雨水稀少，十年九旱。1928年春，陕北地区又遭受了特大旱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国民党政府救灾救济会虽然拨来少许粮款和救灾物资，但横山县县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乘机侵吞，将其挪用来修建监狱，其余部分也被地主豪绅掠夺一空，由此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见此时机，高岗在横山县中共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组织广大党团员发动农民抗捐、抗租。在党的领导下，清坪堡、黑木头川、响水、油房头等地数千人涌向县城，围城请愿，要求政府免除粮款。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横山县县长张斗山被迫宣布免除粮款，围城抗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逐步高涨的农民运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反动政府加紧了对高岗等共产党人的迫害。1928年秋，党组织决定高岗离开横山，到佳县、吴堡一带组织群众抗粮抗捐。不久，又调高岗到肤施县（今延安县）开展地下工作。

3 打入敌军搞兵运

论及高岗的兵运工作，还应当从刘志丹的武装斗争讲起。

刘志丹、谢子长与高岗可谓校友，三人都曾经在榆林中学读书。但高岗入榆林中学的1925年，刘志丹已经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的高才生，谢子长则是在北京开展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

刘志丹是1925年末，被中共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的。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参加了东征。同年冬，奉派赴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次年春，又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军阀吴佩孚部所属的刘镇华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返回陕西，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1928年春，按照省委的部署，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来到归属于军阀李虎臣部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许权中旅是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领导的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全旅有1200多人，其中有160多名共产党员，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刘志丹等来到许权中旅后，党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部队驻地附近的农民运动也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武装起义的条件逐步成熟。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加紧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年5月10日，震动全国的渭华起义爆发，“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队长（共四个大队），王泰吉任参谋长，许权中任总顾问。

同年8月，渭华起义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又回到了西安。

同年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委员，返回陕北，开展兵运工作。

陕北特委是 1928 年 4 月正式成立的。特委下辖榆林、神木、延安等八个县委，三个直属区委及一个直属支部。1929 年四五月间，特委在榆林红石峡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刘志丹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在当前形势下，应以做兵运工作为主。

红石峡会议对于党在陕北领导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会议提出党在搞工运、农运、学运的同时，要将今后工作的重点由学运、农运转到兵运上来。并要求大部分党员要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做兵运工作，“借水养鱼”，以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后，刘志丹来到延安布置贯彻会议精神，向当时正在延安的高岗等中共党员传达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在红石峡会议之前，高岗已经在组织的安排下，化名为“高岗”，打入国民党延安县党部，任党部录事，开展地下工作了。红石峡会议之后，高岗等决定在国民党军驻延安高双成部搞一次兵变，拉出一批部队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但在即将举行兵变之际却因内部出了叛徒而导致兵变流产，高岗也险些被敌人抓住，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从污水洞爬出城外，才化险为夷。

1930 年春，军阀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把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骑兵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招兵买马、扩展地盘，是土匪、军阀共有的本性。苏雨生见有机可乘，认为这正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便树起大旗，广招兵马，来者不拒。

张东蛟中共陕北特委抓住这一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时机，先后派遣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

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团团长王子元，与谢子长、刘志丹相识，比较开明，愿意借助一些年轻有为的先进分子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把该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先后派遣共产党员张东蛟、高岗、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等到该团，秘密开展兵运工作。

为了培养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30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经与王子元协商，在贺兰县李岗堡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双方商定：学兵队归属王子元部，但由共产党员领导，并任命张东蛟、高岗为学兵队正副队长。

张东蛟，1903年出生于横山县高镇乡张家洼村，既是高岗的同乡，又曾经共同在横山“一高”读书。

他先后入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学习，并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张东蛟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十七军，参加了反奉战争，并升任连长。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于宁夏、甘肃、北平、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初打入王子元部后，张东蛟被委任为少校团副，不久又担任了学兵队队长。

学兵队共有40多人，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不同于一般军阀部队那种单调、呆板的机械训练。高岗与张东蛟等在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加强了对学员的革命思想教育，也注重活跃士兵的文化生活。学兵队内还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张东蛟任书记，高岗为副书记。

同年秋，学兵队结业，编入王子元团学兵连。此时张东蛟升任副团长，高岗被任命为学兵连连长。

苏雨生在宁夏大肆扩充实力，威胁到“五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在宁夏的统治地位，引发了“五马”与苏雨生之间的军阀混战。乌合之众的苏雨生部哪里是“马家军”的对

手，一触即溃，四分五裂。刘志丹、谢子长借机带领着中共控制的一部分队伍，包括王子元团的学兵连，转移到了甘肃的庆阳地区。

刘志丹、谢子长的卓越军事才能使他们在陕甘土匪当中也很有威望，庆阳地区的五属清乡司令谭世麟见二人率部到来，便想笼为己有，主动提出要收编这支武装。陕北特委为了保存这支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也想“借水养鱼”，便接受了改编。于是，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部队被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驻守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

不料，正当部队积极扩充、准备寻机起义的时候，遭到了原苏雨生部八旅十六团团长张廷芝的袭击，部队在三道川被打散。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去向陕北特委汇报情况，高岗则辗转回到了老家高家沟。

据杨芝芳老人回忆，高岗是在年末回来的。当时高岗的哥哥高崇义的媳妇已经病逝，老实巴交的高崇义也无力续弦。高岗见状，便出面张罗帮助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和孩子一道，离开了高家沟。

三 参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

概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道路而闻名于世的。

在漫长的 28 年艰难跋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过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而红旗不倒的只有一块，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

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从 1935 年到 1948 年，一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

因此，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深情地说：

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 页。

在黄土高坡上长大的高岗参与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

1 狱中探望刘志丹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和谢子长参加了 1930 年 8 月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寻机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会后，刘志丹继续辗转于陕甘边一带搞兵运工作。

1931 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继续与苏雨生部合作，争取联合苏雨生部参加到计划中的西北反蒋大同盟中。

有奶便是娘，占山便是王，这是军阀的共性，苏雨生也不例外。自被“马家军”击溃后，他又收拾残部，逃到了陕西，投奔了杨虎城，被杨虎城收编为警备骑兵旅，驻防彬县。

由于有过与苏雨生合作的经历，刘志丹接省委指示后，立即率部来到了彬县，任苏雨生部团长，驻守旬邑职田镇。刘志丹在职田镇一方面训练部队准备起义，一方面发动群众，分了地主老财的钱粮，大地主刘日新上吊自杀。

刘志丹的义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遭到了地主老财的攻击。气急败坏的当地豪绅联名写状子到西安诬告刘志丹，说“渭华暴乱的匪首”又在旬邑作乱。

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指示下，反复无常的苏雨生借机逮捕了刘志丹，并给刘志丹戴上了 12 斤重的铁镣，严刑拷打，押入大牢。

刘志丹的被捕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并委派时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岗赶到彬县探望刘志丹。

高岗是离开老家高家沟后来到省委机关担任交通工作的。接省委的指示后，高岗即刻只身一人来到了彬县监狱，与刘志丹会面。

高岗后来回忆说：

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24 日。

关于刘志丹入狱后省委派人来看望的情况，虽然目前一些出版物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有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之间的大段对话，但实际上这些很生动的内容都是对高岗在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记述的演绎。因为当事人刘志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回忆，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另一个当事人高岗的这段简短叙述。

然而，那些大段描写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如何交谈的著述，并没有说这个“省委派来的人”就是高岗。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地开展兵运工作，在西北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亲自找杨虎城说情，请求杨虎城命令苏雨生放人。

在多方营救下，杨虎城下令苏雨生放人。曾经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彬县接刘志丹出狱，使愈挫愈坚的刘志丹重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中。

2 参加陕甘游击队

1931年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璋部，开展兵运工作。

陈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他当时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四面楚歌，处境不利，急需帮助。所以，他虽然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却仍然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也借此以陈的名山义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招兵买马，寻机兵变。

这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策动甘肃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委派与刘志丹多次交往的高岗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

关于高岗与刘志丹在这期间的联系情况，长期与高岗在一起工作的张秀山曾经有过如下回忆：

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塬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第 297 页。

然而，这些单纯的兵变明显带有盲动的痕迹，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与陈璋冲突中被打散。

部队被打散后，刘志丹只身回到了南梁堡，高岗则又返回了驻西安的陕西省委。

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战屡败，使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恰在此时，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阎红彦，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陕北硬汉，1909 年 9 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贫苦农民家庭。1924 年，不满 15 岁的阎红彦就因生活所迫，到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

李象九是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革命气息浓郁，使阎红彦迅速成长。1925 年 4 月，不满 16 岁的阎红彦便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阎红彦跟随李象九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西进。9月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到陕北后，9月6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的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来到了阎红彦的老家安定县，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上了头，并通过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也迅速地由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

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璋部兵变失败后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为了加强对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领导，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了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

从此，高岗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

3 临镇失守

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

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

1931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1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

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

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

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

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

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

《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

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

《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

“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

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

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

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

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

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峁，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

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

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

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 30 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 1928 年到 1929 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

当时，我们也想找刘志丹，我们那时有四十多条枪，六七十个人，大部分是徒手，多半是大刀、长矛。他们动员我们去找大部队，我们也愿意一块联合行动。于是，把自来得枪还给了高岗，把我们先锋队编成两个中队，他们十九个人编成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并任先锋队总指挥。

我们大队从临镇以南往下，赶了几天，高双成派两个营又追我们，我们决定经南泥湾、延安南三十铺、高桥川绕过安条岭到保安瓦子川再到合水太白去盘克塬找刘志丹。因我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三十铺红市沟养伤。红市沟老乡均是横山下来的移民，很好，高岗认识。于是，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带队向盘克塬方向去了。

高岗带部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粮食，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十来条枪和八十多匹骡马，平均每人一匹马。刘志丹想成立骑兵，高岗就准备带马回去。这时，敌人在延安的驻军二五六旅得知了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追了上来。保安县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部队进到安条岭的深腰，山岭上的敌民团首先开枪，正好打在后卫部队。马怕枪，往后便跑，冲散了尾随之敌，部队乘机躲进树林隐蔽撤退。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一人向右侧逃脱了。

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能如此详细地叙述高岗临镇战斗后情况的人，看来只有高朗亭了。从高朗亭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高岗在临镇失守后，既没有投降，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收拾残部，继续在战斗中寻找大部队。虽然高岗在安条岭战斗中又一次“逃脱”了，但在后来的叙述中读者们还会看到，在当年那种革命力量弱小、战斗异常复杂惨烈的环境下，部队被打散、领导人频繁更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1981年6月3日，同样参加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王世泰说了这样一番深有感触的话：

我到陕甘游击队的那一年，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领导水平，实际也是时代条件问题。《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4 西安脱险

安条岭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高岗腿部负伤，只身一人拄着一根树棍来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之后又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处躲避养伤。后又辗转数日，于1932年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

由于高岗对临镇战斗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予高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这是高岗的第一次被撤职，而此时的陕甘游击队，也正处于连续失败的艰苦时期。

临镇战斗后，陕甘游击队转入韩城县境，打算在韩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韩城位于关中和陕北之间，是进出潼关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战略选择而言，落脚此地建立根据地并非上策，因为敌人绝不容许在此战略要地形成革命根据地，必然疯狂地进行“围剿”。果然，6月下旬，敌人派出重兵，向游击队据守的禹山、香山阵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顽强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过半，被迫放弃阵地，退入桥山。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人拦截，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

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6月底，部队在梁家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对游击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并决定全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团。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

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高岗正是在梁家堡会议后回到部队的。高岗归队不久，即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

1932年冬，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高岗奉命来到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部队进行了联络，并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将陕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1933年春，高岗奉命来到了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

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春率部举行了麟游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并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先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和骑兵团团长。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的领导下，

贾拓夫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

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时，高岗已经回到了陕西省委。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不妙，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趁乱跑开脱险。

这次西安脱险，是高岗传奇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后来也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最为可信的，是当事人贾拓夫在当时的回忆。

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就陕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叙述到“福盛楼事件”时说：

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的地方，秘书处、军委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饭馆去开。开会时岳栋（即萧章）、励君（即杜衡）、高麻子（即高岗）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旋即出去，也不注意，并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账。岳栋、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账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而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个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

高岗“幸逃脱”后干什么了呢？

贾拓夫在这份报告中继续说：

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

“高饶事件”发生后，贾拓夫还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谈到过这次“福盛楼事件”：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到西安。高岗在做了王泰吉骑兵团的哗变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萧章、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借吃饭的机会召开省委会议，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捕人（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萧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

在这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回忆材料中，贾拓夫还认为：

高岗能爬上去，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二是 1937 年苏区党代表会议，那时高岗的地位已开始形成。由于 1935 年陕北错误肃反，使许多同志含冤，高岗代表了一方面，得到了大会代表的拥护，在选举边区书记时，高岗得票最高。三是 1942 年边区党的高干会。会议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 年 4 月 4 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虽然“爬上去”的用语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今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

四 恢复红二十六军

概述

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建立的主力红军部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红二十六军能够从挫折中奋起，高岗是功不可没的。

1 陈家坡会议

高岗于 1932 年 6 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1932 年 7 月 23 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 1932 年 12 月 18 日来到了游击队。12 月 22 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

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决定在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属铜川市）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部队开赴照金后，很快就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祥任总指挥。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东起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4月下旬，敌人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面对强敌，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

然而，形势的好转却使杜衡的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强令红二团乘胜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结果，部队在南下抵达蓝田张家坪时，遭遇强敌伏击。指战员虽经血战，但仅有不足百人得以突围。

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打散了。

杜衡是在红二团南下不久只身一人返回西安陕西省委驻地的。他回西安后，即在福盛楼被捕并叛变。而高岗则是在福盛楼逃脱后按照与贾拓夫的商定，直奔照金苏区。

本来按照贾拓夫与高岗的商定，也是中共陕西省委以前就做好的安排，高岗是到位于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工作。但王泰吉骑兵团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后，在三原轆轳把村被敌人打散，余部已经退到了照金，所以，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就直接来到了照金。

高岗于8月初到达照金地区时，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

红二团南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同时建立了新的渭北游击队。7月21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也乘势建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王泰吉率领余部300余人，于8月初进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也于此时来到这里。然而，几支革命力量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又纠集了九个团的兵力向渭北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渭北根据地也被敌人所占领。

在此关键时期，高岗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代表，与陕甘边特委一道，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对重建红二十六军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就在照金，汇集到照金的革命武装主要有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几支游击队，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陕西省委的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秦武山，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以及其他几名军队干部。

陈家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虽然这次会议不可能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但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这次通宵达旦的会议是如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正确的路线。

1983年4月，参加了陈家坡会议的习仲勋回忆说：

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召开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为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当时陈家坡会议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是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反对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主张把红四团带回渭北，不承认高岗为省委代表；一种是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持扩大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会议终于以后一种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并拟定了有战略意义的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创立计划。所以，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1988年3月，同样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说：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

仲勋、李妙斋、杨森、高岗、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伯栋、陈子鼎，还有几个连队指导员、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上，讨论了三支革命武装会合照金苏区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三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能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围绕这两种意见，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绝大多数赞成第一种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同时，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会议。实践证明，它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与会者秦武山也在 1983 年回忆说：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在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子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部的人选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问题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通过上述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会议时间长、争论激烈，但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高岗是代表陕西省委参加并主持这次会议的。在这次对重建红二十六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并基本上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他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

2 违纪被撤职

陈家坡会议后，部队按照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不打大仗，集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频频出击，节节胜利。10月4日，刘志丹又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更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

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0月上旬，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高岗与王泰吉、刘志丹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敌周旋，必须跳出包围，转到外线作战。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游击队留守内线，坚持斗争。10月10日，红军主力出发北上。18日，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毙伤敌人200多名，缴枪百余支，使部队声威大震。紧接着，部队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门重创敌赵文治团，使该团元气大伤，不敢再战。

然而，红军主力在外线的胜利仍然无法避免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失守。虽然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血战，在保卫照金根据地的首府薛家寨的战斗中，一天曾经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游击队也伤亡惨重。敌人于10月16日占领了薛家寨，坚持了十个月之久的照金根据地终于失守。

照金根据地的失守，使陕甘边红军再次陷入漂泊的困境。到哪里安家？怎样发展？由谁来领导？这支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为了决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作出了三项极其重要的决定：

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

第二，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在这三个游击区分别由四十二师派出一些干部，建立三路游击队。

第三，军事后方移至南梁，创建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1月8日，部队根据包家寨会议决定，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全师人枪500余，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两个团。同时建立了红四十二师党委，由杨森任党委书记。

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今志丹县）均很远，南却与原照金革命根据地相邻。南梁地区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凤川等，方圆百余里。这里重峦叠嶂，梢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红四十二师于11月中旬进入南梁地区后，首先扫荡了反动民团，然后发动民众，在各地逐步建立起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红四十二师还派出一批军事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为了廓清南梁外围，红四十二师主

力在根据地基本建立后，又主动转入外线，先后击溃了井岳秀部一个营，全歼了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为创建并巩固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高岗为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然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高岗却过不了美色关。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并报告了师党委

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蒿家砭召开会议。此时红四十二师因1月初师长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已经由刘志丹任师长。这次会议对高岗在正宁南邑堡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决定撤销他的师政委职务，由师党委书记杨森接任。

高岗因违纪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后，被下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是杨琪。

包家寨会议决定开辟三个战略游击区，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后，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建立，各路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当时第一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安定县一带，第二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由于第二路游击队实际上就在南梁根据地内，能够及时得到红二十四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各路游击队中发展最快。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调集了八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继续采取外线作战的方针，红四十二师跳出南梁，转入外线，二路游击队则坚守南梁，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1934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与高岗、杨琪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然后一起向北进发，突袭蔺家砭，轻取崖窑，在庆阳元城活捉国民党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赵梁子消灭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4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西华池大捷，全歼敌人两个营共600多人，创造了红二十四师成立以来的歼敌最高纪录。西华池大捷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定性一战。

3 复职与再被撤职

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等地，高岗、杨琪仍率领二路游击队坚守南梁

1934年5月中旬，敌人借红军主力离开南梁之机，再次向南梁根据地发动“围剿”，高岗和杨琪则率部与敌周旋。敌军抓不到红军，就以疯狂的仇恨，在占领的区域内毁坏窑洞，焚烧粮食，屠杀牲口，而且还丧心病狂地烧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

高岗、杨琪则指挥二路游击队避敌锋芒，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高岗在动员部队坚持战斗时说：

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果然，二路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攻城拔寨，迫使敌军回撤保家，使敌人“围剿”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破产，南梁根据地又胜利收复。

5月下旬，红四十二师主力又回师南梁。5月28日，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在曲折、复杂甚至是惨烈、悲壮的战争环境下，部队领导人的变化经常、频繁，有时也是出人意料的。高岗从1933年8月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到1934年5月重新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短短的九个月，已经是四任政委了。但这还仅仅是开始，不足两个月后，高岗又一次被撤销了政委的职务。只不过这次被撤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岗个人的过错，而是受“左”倾错误打击的结果。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会师。

提到陕北游击队，还必须从谢子长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谈起。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主，兼开柴草店，家中生活尚可。1919年，谢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与高岗和刘志丹由榆林中学而军校的生涯不同，1922年春，中学尚未毕业的谢子长就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返回家乡办起了一所小学。然而，愿望虽好，办学却并非易事。谢子长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却无钱上学。同年秋，谢子长决心投笔从戎，毅然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离开学兵团，先是回到家乡办起了民团，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并于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谢子长1926年初，谢子长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以县民团团总的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与唐澍等人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

清涧起义失败后，他又受省委的委派，于1928年5月与刘志丹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

从渭华起义起，谢子长与刘志丹经常并肩作战，共同搞兵运，高岗则追随其中。但从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谢子长被迫离开了部队，先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工作，一直到1933年11月，才又被派回陕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1月，谢子长辗转回到了安定县。当时正值陕北根据地困难时期，主力部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经被打散。谢子长回来后，立即集合失散人员，取出埋藏的枪支，于3月8日正式恢复了红一支队。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继派谢子长回陕后，1933年12月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前往陕北工作，并改组了陕北党、团特委。党的特委由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组成，团的特委由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崔田民、宣传部长李铁轮组成。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举行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恢复红一支队，加强红二、三支队，组建红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游击根据地。会后，一支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四、五支队也逐步建立。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崾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游击队下辖一、二、五三个支队，300余人。7月18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攻占县城的先例。

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高岗、杨森率领的红四十二师会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即著名的阎家洼子会议。

由于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而陕北

特委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所以，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

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二是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会后，陕甘边特委调拨步枪一百支、银元数百枚，支援陕北游击队。

如何评价阎家洼子会议？至今公开出版的著述鲜有涉及。

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要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并且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至今仍是个谜。

虽然有的回忆材料说这次会议撤销高岗的职务是因为他在正宁南邑堡战斗中违纪，但通过本书的上述材料读者已经清楚，高岗因违纪而被撤职是在半年以前的藁家砭会议，而且在两个月以前的寨子湾会议上，高岗已经恢复了政委职务。

果真高岗被撤职是个难解之谜？

实际上又并非如此。虽然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中，无法保存会议记录，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材料又受当事者的记忆力以及各种政治环境的影响，未必准确，但 1942 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却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参加阎家洼子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

的干部。虽然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得较早，红军与游击队的实力也比较大，但陕北游击队的郭洪涛和谢子长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他们更了解党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因此，会议首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两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不可能不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然对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进行了一些无端的指责。接着，郭洪涛在发言中又批评红四十二师是“梢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刘志丹、高岗等在发言中对红四十二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选择进行了辩解，

但由于指示信与郭洪涛的发言代表了当时“左”倾中央的基本路线，所以会议还是决定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

1942年11月11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到了阎家洼子会议的情况。由于是当时会议的记录稿，习仲勋的发言又是即兴的，所以有些话未必很恰当。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照录原稿如下：

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七月前后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之一，也不知是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把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了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笑声），但国民党不能让我们

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甚至在打开延长后，还有一位八十四师的政治部李主任，还批评我是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所以我觉得洪涛同志不懂，当时有意识模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的当时斗争的真实事实，而且确实有企图篡军。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如果说习仲勋的发言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

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党内秘密文件虽然没有专门评价阎家洼子会议，但在提到郭洪涛时，有一个括号，在这个括号中，这样写道：

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虽然说是当时的战争时期，部队领导变换频繁，并且无论就资历还是能力，谢子长取代高岗任政委都无可非议，但上述的回忆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已经清楚地回答了高岗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被撤职的原因。

至于如何评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共中央当时的决定，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4 周家硷会议

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虽然担任了红四十二师政委，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并没有留在红四十二师，而是率领陕北游击队返回了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也按照会议的决定，在团长王世泰的带领下，北上安定，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陕北游击队和红四十二师三团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不幸的是，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

阎家洼子会议后，高岗虽然被撤销了红二十四师政委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离开部队，而是以参谋长的名义，与红四十二师二团一起战斗。然而，非常遗憾，从阎家洼子会议到周家硷会议这半年间高岗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目前只见到曾任西北工委书记的崔田夫1945年在谈陕北苏区创建时提到了高岗被撤职后的行踪。

崔田夫说：

七八月间（阎家洼子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笔者注），高岗带了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在安定打垮了敌人，收了百多条枪，又到清涧打了两个胜仗，在安定成立了红一团，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了贫农团和自卫军，实行了分粮。清涧二支队扩大后，到10月成立了红二团，在神府成立了红三团。还有十三四个支队。

年底，高岗北上在安定白庙岔，以红一团、红二团配合几个支队，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南沟岔打了一个胜仗，收了几十条枪和两架轻机关枪，跟着刘志丹也带来一团，统一了陕甘、陕北两苏区，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

高岗为政委。《崔田夫谈陕北苏区创立记》（1945年），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经查实，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团是1934年9月18日在安定县西崖窑沟成立的，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全团200多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团，是1934年底在清涧县大马家山成立的，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全团300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团，也是9月18日在神木县南乡王家庄成立的，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洪飞。全团300多人、100多条枪。

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八十四师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了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击溃了由老君殿开来的援兵。接着，部队乘胜东进，连战连捷，使陕北游击队扩展到延长、延安和宜川一带，并把清涧、安塞、安定、靖边四个县连成了一片。

调刘志丹到陕北来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部队，是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巡视员的决定。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布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相互配合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后，西北逐步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但是，由于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直接归陕甘边特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虽然阎家洼子会议后，两支红军部队有了配合，但基本上还是以各自活动为主。1934年10月黄翰来到陕北后，鉴于谢子长身负重伤的实际情

况，建议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军事领导。黄翰并致信刘志丹，指示刘志丹尽快来陕北。

接指示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部分部队，于12月底奔赴安定。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来到陕北根据地中心区赤源县（今子长县）的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在此地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即著名的周家硷会议。

刘志丹率部来到陕北时，已经率部在陕北活动的高岗立即与刘志丹会合到一起，并一同参加了周家硷会议。由于陕甘边特委的主要领导正在领导反“围剿”斗争，没有到会，所以，参加周家硷会议的除刘志丹、高岗外，还有陕北特委的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白坚作记录。

周家硷会议召开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因此，会议首先研究军事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

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又产生了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因此，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未到任前由崔田夫代理），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张秀山。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

周家硷会议不久，2月21日，时年39岁的谢子长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西北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有“谢青天”之称。

谢子长的逝世是党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然而，历史的机遇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二号人物。

五 在反“围剿”战斗中

概述

陕北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但首先到陕北落脚的是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北上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土生土长的高岗与陕北之外的中共组织和红军部队联系到了一起，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但机遇是一把双刃剑，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也使高岗遭受了一次险些成为“刀下鬼”的噩运。

1 打横山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对专有名词。

这一对相辅相成的名词使用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指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进攻；反“围剿”，则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进行的战斗。

“围剿”与反“围剿”发生的空间并非是一块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已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极其艰难、险恶、前途未卜的长征。

西北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不同，总共经历了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才刚刚打响。

1935年初，蒋介石在取得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在继续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开始把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重点转到了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

1月，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而且部分游击队员拿的是大刀长矛，既缺乏军事训练，又缺少战斗经验。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军压境，情况危急。

然而，身经百战的刘志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意见，确定了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却在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为了保证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刘志丹还亲自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起草了粉

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少先队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5月3日，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在安定玉家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作战行动。

高岗从谢子长逝世后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到就任前敌指挥部政委，又一次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就客观而言，高岗与刘志丹这位才干突出、情操高尚的优秀共产党人共同战斗，必定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增长才干。高岗在后来成为“西北王”后，虽然很少提及另一位西北根据地的创立者谢子长，但他对刘志丹还是钦佩有加的。1943年3月，在纪念刘志丹逝世七周年时，高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虽然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高岗在“推刘压谢抬高自己”，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高岗确实与刘志丹相识较早，共事较深。高岗后来能为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与刘志丹对他的影响和两人曾经同甘共苦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

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31日的南沟岔战斗开始，到同年8月21日的定仙塬战斗结束，历时近8个月，消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

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西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关于刘志丹与西北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连战连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的史实，在有关的著述中已多有描述，本书不加赘述。虽然这些讲述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文章和书籍都只讲总指挥刘志丹，不提政委高岗，但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高岗与刘志丹一直共同指挥战斗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尚未散尽，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又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共十万多人马，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兵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围剿”。

8月21日的定仙塬战斗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先例，是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标志性战斗。定仙塬战斗后，8月25日，刘志丹、高岗率领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延川县的文安驿，在8月27日召开了目前少有论及的前总文安驿会议，并在会议后进行了至今也争议颇多的横山战斗。

在西北红军主力到达文安驿之前，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在延川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由于在前线作战的刘志丹、高岗等委员们无法参加会议，因此，部队到达文安驿后，刘志丹、高岗便派红二十七军一团政委张达志去永坪镇，请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来文安驿传达永坪镇会议精神。

朱理治是1935年7月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代表来到延川县永坪镇的。不久，上海中央局又派聂洪钧到陕北，并由朱理治、聂洪钧等组成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团，由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党的活动。

8月26日，朱理治与郭洪涛来到了文安驿，第二天，便召开了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即文安驿会议。

关于文安驿会议的情况，去请朱理治和郭洪涛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达志后来回忆说：

朱理治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西北形势和红军的任务。他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求陕北红军先在南面打下延安县城，北面打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县城，并且批评陕北红军过去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九期。

虽然在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对朱理治提出的红军下一步作战计划表示怀疑，但由于朱理治坚持己见，而西北代表团又是党中央派驻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因此，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上级领导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要首先攻打瓦窑堡或清涧县城。

9月3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团以上的指挥人员，来到瓦窑堡郊外查勘地形，了解情况。

一行人爬上瓦窑堡近郊的黑山梁，不用借助望远镜，就可见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沟壑纵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敌人在墙外布满了梅花陷坑，每个梅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金属刺，而且全部梅花陷坑都在碉堡的交叉火力控制之下。面对着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志丹、高岗以及各团指挥员一致认为，如果强攻瓦窑堡，纯粹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项任务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

瓦窑堡无法攻破，清涧县城的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坚固，地形更险要，更没有强攻的可能。怎么办？不攻城拔寨，违背上级领导的

命令；勉强硬攻，则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正当指挥员们议论纷纷时，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提出了一个既不打瓦窑堡也不打清涧县、但又不违抗命令消极怠工的良策：改打敌人防守薄弱的横山县。

这个曹动之，就是当年与高岗一起发动““一高”学潮”，又同时被校方开除，转入榆林中学的高岗同乡。高岗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后，热情追求新思潮的曹动之因在榆林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而被开除，回到了横山县。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后来他奉命打入军阀部队搞兵运，并于1934年率部参加了红二十七军。

曹动之对于自己生长的横山县十分熟悉，他向刘志丹、高岗介绍说，虽然横山县城险要，但工事简略，只有国民党军一个骑兵三营驻守，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便可一举攻破。

与曹动之经历相同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高岗，自然对横山县城也很熟悉。他在曹动之介绍完情况后，首先表示同意改打横山县城，认为曹动之的意见很有道理，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总指挥刘志丹见没有异议，便立即作出决定：放弃攻打瓦窑堡和清涧县，奔袭横山县城。

9月9日，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在曹动之的带引下，来到了卧牛城根据地。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于11日拂晓赶到了横山城下。

凌晨，攻城战斗打响。

关于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担任主攻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于1983年11月10日做了如下回忆：

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第一次奔袭横山县城，是于1935年8月27日文安驿会议后，在卧牛城一带做的战斗准备。其中参战

的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其中参战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团长是我，政委是张达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红一团是主攻，位于横山城的北面，约有八九百人。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断了，所以使梯子显得短了，经几次攀登后，被敌人发觉，后采取强攻，还是没有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最后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其中我团三连连长和通讯员也都牺牲了。所以下午前敌总指挥命令我军撤退了。

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做了回忆。

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

由于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高低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说有一处很低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致使我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我军只好实行强攻，一直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我军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30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据此就像有些回忆材料那样，把打横山失利的责任推到高岗的头上，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打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的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十分支持，他们纷纷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所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很可惜，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9 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述。

2 永坪镇会师

打横山失利后，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返回到清涧县一带活动。恰在此时，传来了红二十五军到来的消息，刘志丹、高岗立即奉命率部赶往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二十五军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部队沿途冲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越过桐柏山，横跨豫南，转战千里，于12月上旬进入陕西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创造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连战连捷。1935年7月初，红二十五军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因此，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泮峪口出发，出秦岭，渡渭河，过六盘山，驰骋于陇南陇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然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于9月7日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由于政委吴焕先已经在战斗中牺牲，所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中共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并指令西北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9月15日到达永坪镇的。16日，刘志丹与高岗就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来到了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点，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一块一块的根据地。由此，也就形成了分别活动

在不同根据地的一支支红军部队。然而，虽然根据地是分块的，各支红军部队是相对独立活动的，但领导这些根据地和红军的党却只有一个，党中央对各个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无论从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还是土生土长的西北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两支红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即9月17日，在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会师后的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8000余人。

红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胜利会合，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的革命力量，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本书的传主在这场两军大会师中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只是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接下来开展的劳山战役中，这位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却上演了一幕“赤臂战劳山”的传奇故事。

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被蒋介石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也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共匪”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红十五军团确定了佯攻甘泉、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先以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主力则埋伏于甘泉北 30 里的劳山。当一一〇师匆忙由延安来增援甘泉守军时，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全歼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获 3700 多人，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皆被击毙。

在这场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第一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七十八师的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时，高岗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谈论的高岗“赤臂战劳山”。

3 蒙冤入狱

劳山大捷后，东北军的骄横气焰遭受重挫，瓦窑堡守敌弃城而逃，红十五军团乘胜拔除了瓦窑堡周围的全部敌据点，根据地的首府也迁到了瓦窑堡。10 月 25 日，红十五军团又对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守卫的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等官兵 1800 多名。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西北剿总”急忙调整部署，调集重兵，组织新的进攻。

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刻，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肃反”事件？虽然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但具体负责这场“肃反”的朱理治还是最有发言权。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往事回忆》中对当年的这场“肃反”事件的缘由做了详细的叙述：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7 月出版，第 449 页。

仅凭“听说”、“感到”就开始的“肃反”，远非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早在劳山战役之前的 9 月 21 日，刚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就发出指示，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残酷捕杀自己人的“肃反”。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在内的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根据地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 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好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这场革命队伍内部的“肃反”中惨遭杀害。

高岗与刘志丹都是在劳山战役后从前线被骗回瓦窑堡，然后被捕入狱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入狱后的有关材料，但从赵启民的回忆中可见他们被捕后的遭遇。

1981年10月1日，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写了一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回忆文章。文章写道：

我是在杨森同志离开后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被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杨森是七十八师师长，已先被捕）。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年10月1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肃反”是“左”倾错误在根据地表现的极端。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黑白颠倒，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它的残酷则在于不但不允许蒙冤

者辩解，而且也不给你“改过”的机会，直接挥刀将你杀掉；它的悲哀则源于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伟业。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恰好于“左”倾错误者已经举起了屠刀的危急时刻来到了陕北；如果历史与人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中央红军虽然到了陕北但却没有及时听到“肃反”的噩讯；如果毛泽东虽然听到了“肃反”的消息但稍一犹豫，未果断下令“刀下留人”；如果……那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后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军将领，就将与那 200 多个被错杀的冤魂一样，弃尸荒野，了无踪迹。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马文瑞 1942 年 11 月 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开了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玩笑”：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这个苏区，对我们这些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11 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关于西北根据地发生的这次“肃反”，1942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曾经作出了《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虽然后人对这份党内秘密文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终究是 1942 年时的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审查结论，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因此，本书将这份文件中说明“肃反”情况及表明中央对“肃反”态度的部分照录如下：

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 1935 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

逮捕，并杀害了 200 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预定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后果），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 1935 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

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地处理张翰（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在）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但是，中央虽然对此事件作出了决定，可人们的认识分歧并未完结。对西北党的历史以及中央的这份决定，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争论仍然很大。

因此，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 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础上，于 1945 年 7 月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

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 1935 年陕北的“肃反”问题似乎应当盖棺论定了。然而，1954 年“高饶事件”出来后，1935 年陕北“肃反”问题又被提起。

1956年9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述，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的问题。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基本上否定了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主要观点。

1978年12月21日，中组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删掉了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

此举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张秀山等给中组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澄清事实，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28号文件），基本上坚持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28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

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8页。

4 “刀下留人”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 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 年 9 月 17 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 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回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既有红军，并且还是两支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会后，立即组建了由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歼，并乘胜将后续的三个团击溃，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切尾巴”战斗的前一天，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并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

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页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西北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及时、果断的，也是慎重、严肃的。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机关驻地下寺湾；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机关驻地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后因谢维俊被叛匪杀害，特委未建立）。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1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

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党务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在会上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了刘志丹、高岗等受冤屈的同志是无罪的。

这份被李维汉称为“也有缺点错误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这样公布的：

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

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指出：

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背景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使高岗幸免于难。虽然此时西北根据地的代表还是刘志丹，西北党的领导人还有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毛泽东对高岗还未必有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对高岗而言，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命丧黄泉；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也很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可能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对高岗印象不深，但高岗对毛泽东是非常感激的。

只是这种感激之情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六 连升三级

概述

命运多变，职务频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在战争年代的领导者身上屡见不鲜。

然而，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虽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取决于大环境的改变。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形成，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为高岗个人的升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还要经受一些磨难，但鲜花已在招手，掌声即将响起。

1 戍守三边

高岗获释后，先是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后于 1936 年 1 月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当时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后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西北根据地的干部，认为郭洪涛、朱理治当时对在“肃反”中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后仍然压制，未予重用，安排得不当。马文瑞曾在会议上说，把高岗“放在草地上让他做蒙古的工作，这等于流放，好像苏武牧羊”《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 年 11 月 11 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李维汉后来也说：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373 页。

马文瑞的“苏武牧羊”论也是高岗的想法。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郭洪涛派我带 13 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客观地说，李维汉的评论是公允的，当时对高岗等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从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在高岗看来，既然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及时行乐吧。所以，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交代说：

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生活作风腐化，是高岗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够彻底改正的错误。

但高岗也并非酒色之徒，打土匪，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高岗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很快就率部与当地的蒙汉游击队一道，打出了一片天地。

不久，高岗即被派往中共三边三边指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

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早在高岗来三边之前的 1935 年 12 月 20 日，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这个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496 页。

要联合内蒙古同胞抗日反蒋，就必须首先主动与蒙古族上层认识联系，做好蒙古族上层的工作。对此，高岗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6 年 5 月 27 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

1936 年 1 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

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 200 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 年 7 月 31 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 月 8 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 1000 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 年 4 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 10 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

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曹怀文回忆西北革命斗争》（1985年1月30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

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枪，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 31 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1936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

2 高司令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不管高岗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内心作何感想，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

来定边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虽然定边的生活条件比安定更艰苦，但一生勤劳的杨芝芳并不在乎环境如何。与频繁的战斗生涯比较起来，高岗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已经是相对稳定了。能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对于杨芝芳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儿子老虎（当时还叫“赖狗”）6 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眼见着自己养育的小生命渐渐长大，这对于丈夫经常不在身边的杨芝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高岗到远离中央所在地的三边地区工作，业绩还是不俗的。但高岗由三边调到延安，却与其他因素有关。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他的壮烈牺牲不但是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不但才华横溢，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品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中央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后，虽然刘志丹仅被安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他顾全大局，没有怨言。东征战役开始后，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血洒疆场，奉献一生。

由于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刚刚到达陕北，陕北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根据地领袖。因此，当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去世后，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高岗就自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更加注重发挥高岗在陕北的特殊作用，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它对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直接影响，则是事变后的第五天，即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又过了半个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高岗离开定边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高岗虽然还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阐述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在结论中，毛泽东还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重申了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重要观点，认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刚刚结束，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叫苏区党代表大会）即在延安召开。这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首届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理应参加这次党的重要会议。然而，十分可惜，高岗并没有能够成为会议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不是会议代表的高岗竟然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5月16日，苏区党代表大会秘书处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选举结果：

高岗：83票；林伯渠：82票；吴亮平：78票；马明方：78票；李富春：71票；周兴：69票；李坚贞：68票；郭洪涛：64票；王达成：61票；习仲勋：60票；白治民：59票；刘长胜：57票；崔田民：49票；张秀山：48票；刘景范：48票；崔田夫：46票；李维汉：43票。

以上17人当选为边区党委正式执委。

罗铎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六人当选为边区党委候补执委。

17日，第一次执委会议进行了书记和各部部长的选举，确定由郭洪涛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两省委逐步撤销，党在陕甘边地区的领导机构又逐步归于统一。

中共陕甘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高岗虽然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但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动，仍然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不过，高岗在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仍然以最高票数当选，确实说明了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书记。中央初到陕北时成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所属的蒙古工作部和回民工作部。

虽然担任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也难说是重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但表明高岗在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确有业绩，也意味着高岗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选拔视野，非常有可能成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之一了。

在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边区政府的建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步伐加快。9月6日，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与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

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下辖陕西、宁夏、甘肃的 23 个县（市），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50 万。

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秘书长为伍修权，民政厅厅长为马明方，财政厅厅长由林伯渠兼任，教育厅厅长为徐特立，建设厅厅长为刘景范，贸易局局长为叶季壮，保安司令为高岗。

虽然高岗在三边时也被称为“司令”，但那时的十几人的“司令”与此时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这时的保安部队也只是由原来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镇压汉奸、清剿土匪、维持边区的治安等活动。但此时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在党内，他是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政府，已经升任保安司令，并且很快又将成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11 月 16 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指出：

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急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族开展游击战，保卫三边。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及蒙汉支队北出，活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护绥远的口号，去发动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系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扩大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以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远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看起来，当年戍守三边并非是件坏事。正因为有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经历，高岗才能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能够荣任八路军骑兵司令，对于高岗而言确实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这不但表明党中央对于高岗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给予了认可，更是有可能得到更大重用的信号。因此，接命令后，高岗立即率部开到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蒙古族同胞，清剿土匪，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这时开始，高岗可以经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记录上，也可以找到高岗的名字了。例如，在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决定高岗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榆林工作，与傅作义、邓宝珊协商办蒙民干部训练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唯一一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中央军委从三个主力师中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兵团共有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就是高岗任司令的保安部队，共有4000余人。此外，还有基干自卫军2万多人、普通自卫军14万余人。

193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边区保安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后，高岗虽然还兼任保安司令，但他的主要工作，已由军事斗争转到了党的领导工作上。

3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

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 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 1933 年 7 月率领骑兵团近 2000 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 年 1 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 1934 年 3 月 3 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 1934 年 1 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 年 11 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

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

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

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

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

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 1941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 128 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4 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到达陕北时规定的领导体制，就一直归张闻天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不过，张闻天这位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自 1939 年初起，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因此，1940 年 9 月 1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谢觉哉商量。

既然是毛泽东提议商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意外的。9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 19 人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中本地干部 11 人，外来干部 8 人），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 8 人为常委。会议还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还决定，边区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为主任；军委系统的财经委员会、中直机关的财经管理处的负责人，参加边区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经济生产工作归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政分系统管理。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岗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和张闻天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表示说，为了做好工作，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

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成立了边区中央局，但对中央局的领导体制和职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些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二是加强和充实中央局各部门的干部。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原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改任建设厅长，原建设厅长改任民政厅长。

会议同时还决定：

（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

（二）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 40 万元。

（三）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公开职务是秘书长。

（四）由中央组织部调 39 名干部充实边区中央局机关。

这是一次明确界定边区中央局职权与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权力的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的人事安排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边区中央局已经由党在一般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上升到党中央以及中国革命大本营所在地的领导机关，直接划归中共中央领导，高岗也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了。

然而，改革仍未到位，变动还要继续，高岗还要高升。

1941 年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原则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 1939 年初成立的，主要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内蒙各省区地下党的工作，书记由张闻天兼任，日常工作由李维汉和贾拓夫负责）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名单由任弼时与陈云商定；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

政治局会议的原则决定很快得到了落实。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委员为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候补委员为李卓然、贾拓夫，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隶属西北中央局。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康生、陈云参加，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

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

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特此通知。

至此，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4月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七 连任参议会议长

概述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旗帜。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历史已经注定高岗要承担更多的权力与荣誉。

高岗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党的负责人，他还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三届的参议会议长。

1 离婚与再婚

高岗是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的。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辛，涌入延安。

青年，是热血沸腾、蓬勃向上的标志；青年，也意味着阳光灿烂、青春爱情。

当时虽然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革命圣地延安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这批大浪淘沙的将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正脊梁。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报国的大批知识青年也来到了延安。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高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结发之妻杨芝芳离异的。

爱情是可以跨越时空、不分民族、不计年龄而超现实展开的，但婚姻是具体的、讲条件的、有缘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

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分开后，我们还是革命同志，经常有联系，他作报告我也去听。我与李力群（高岗的第二位妻子）相处得也很好。

满头银丝的世纪老人在谈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时，声音轻微，心态沉稳，神态安详，使人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回到了那并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岁月的沧桑在不停地冲刷着人们心灵的伤痕，时间老人会帮助任何人走出悲伤。

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杨芝芳老人虽然忘记了她与高岗是哪月离婚的，但她记得大致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江青是 1938 年 11 月结婚的。

高岗与杨芝芳离异后并未马上结婚，到了 1940 年，高岗才与时年 19 岁的李力群缔结良缘。

1921 年 12 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的李力群与目不识丁的杨芝芳不同，1937 年来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市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与几位同学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辗转来到了西安，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炉，热血青年在这里迅速成长。1938年，李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夙愿。

然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她毫无准备时已经悄然降临身边。

1998年11月12日，笔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采访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离休老人。未谋面之前，因为在材料中已经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与高岗结婚的，所以在笔者脑海中跳跃着的总是一个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腰带一脸稚气的小八路。

然而，真实地坐在笔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耄耋妇人。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也很健谈。虽然坎坷的岁月使老人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笔者谈起了她半个世纪前与高岗结婚时的戏剧性场面：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真让现代青年男女们无法想象，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来到延安的李力群，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包办”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没恋爱”的暗箱中被“操纵”成婚。

不过，这并非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只不过带有浓厚的现代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足足伴随着李力群度过了坎坷的半个多世纪。

李力群与高岗结婚后，虽然半年内未被准许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李力群始终与高岗战斗在延安。

2 参议会会议长

参议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中国的参议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分属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两个方面，而且从参议会诞生之初，就具有不同的性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施了一些民主措施，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合法地位。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防参政会，邀请各党派和社会名流参加，共议国是。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也决定要成立“国民参政会”，并于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9月下旬和10月初，又相继公布了省、市参政会的组织条例。

虽然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持下难以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具有初步民主形式的咨询机构，因此，它仍为各党派和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所以，就国民参政会的诞生，1938年6月1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短评说：

虽然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人员成分，不能完全如国人所希望，可是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抗日民主的模范。早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使用。

这一纲要规定：

“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

从同年7月起，乡级代表会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逐步产生，然后由代表会和参议会选举出各级行政长官，并把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呈请国民政府加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后，为了在名称上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促进地方参议会的早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1月25日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并积极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不同，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参议会，不但事关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而且必然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对如何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布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但它并不希望中共打出参议会的旗号，不想让民主的旗帜在陕甘宁边区飘扬。所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后，国民党政府竟然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来电报，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要向外宣传。

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原则。

边区议会要开，而且必须开好。参议会的名称要用，而且必须用足。为此，由谁来做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呢？这可是中共的第一位参议会议长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党政合一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而且一年多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高岗胜任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决定，由高岗来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后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较好地履行了议长的职责，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连续三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职务。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的。到会的参议员共有145人，加上国共两党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地主、社会名流等各界来宾，约有7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从1月17日到2月4日共开了19天，毛泽东三次到会发表讲话。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1937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在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

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报告最后指出：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

为国为民的共产党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当取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两年后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各部门工作的总结，作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常驻参议员为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常务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大会向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全体将士和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了专电，还发表了《告边区同胞书》。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胜利闭幕。

关于本届参议会的特点，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在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论，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真正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第二，它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第三，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

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在第二届参议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提议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此时的抗日战争虽然仍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政权稳固，人心安定，民主气氛愈加浓厚。

第二届参议会在新修建的“民主之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这是陕甘宁边区空前的民主盛会，也是高岗在黄土高坡上极为风光的时刻。1941年11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特讯，详

细记述了开幕式的盛况和高岗、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篇报道在本书中全文引用略显冗长，但就其含量而言实属精悍，可省去更多的叙述文字，故全文引用如下：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昨日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高岗、林伯渠、李丹生、安文钦、李鼎铭、贺连城、阿里阿罕、巴素华、马国藩、那素滴勒盖、森健等一百九十三人，候补参议员十六人，政府首长到会者有林主席、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五十余人，来宾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军委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劲武、郭亚生三先生，晋西北行署续主任范亭，晋察冀、冀晋豫、胶东、鲁西、冀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各界来宾等五百余人。各参议员、政府首长、各界来宾准时络绎入场，会场周壁遍悬由各方送来祝贺大会开幕之联幛及边区三年来施政成绩之图表五百余幅，壮丽辉煌，琳琅满目，主席台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及用大字标写的抗战建国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礼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级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振铃开会后，全场肃静中大会筹备会南汉宸同志报告到会参议员已过法定人数，当即请前届议长高岗同志宣布开会，立时乐音奏起缭绕全场，后唱国歌，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后，由谢参议员觉哉恭读总理遗嘱，并为抗战死难将士静默三分钟。静默毕由高议长致开幕词，首先申述国内外形势，指出这次参议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团结全边区人民，坚持抗战，检查政府工作，确定今后施政方针，并选出新的政府。后林主席致词，朱总司令、陈联络参谋相继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与全场参议员来宾颌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同志申述参议会开会之惟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今天

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最后并希望各参议员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参议员兴奋倾听，约三十分钟始毕。后续范亭先生讲话，续范亭先生为老同盟会会员，矢志革命三十余年，语词恳挚，令人感动。后荷印籍参议员阿里阿罕、印度籍参议员巴素华、日籍参议员森健先后分别用英语日语讲话，由专人负责翻译。何思敬教授，文艺家萧军，绥德参议员安文钦，米脂参议员贺连城、赵亚农，女参议员路志亮，华侨参议员李介夫，工人参议员李平等先后就民主政治之意义及本届参议会之任务发表意见后宣告休会。

会议的第二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高岗以 152 票当选，连任第二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以 139 票、李鼎铭以 129 票当选为副议长。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高岗

这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此《纲领》于 1942 年 5 月 1 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故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通过了李鼎铭等 11 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及其他各类提案共 380 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各厅长是：建设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教育厅厅长贺连城；秘书长周文。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修改的。《纲领》共 21 条，毛泽东做过多次修改，而且其中的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

直接起草的。1942年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提出：

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

5月26日，高岗撰写了《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奋斗》的长篇文章在《解放》杂志第一二九期发表。文章论述了《五一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对如何贯彻实施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是1946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此时的高岗已经从黄土地来到了黑土地，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仍然选举高岗任議長。到会正式議員 111 名，经无记名投票，高岗以 87 票连任。

为什么在高岗已经离开陕北后仍然选举高岗任議長？

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尚无能够替代高岗的更合适的人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既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民意机关。参议会议长作为边区的代表，必须由边区内最有威信者担任，而能够以陕甘宁边区代言人出现的，当时又只有高岗。

高岗于4月3日连任議長后，1946年4月4日的《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记者说的这样一段话：

高議長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議長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1941年二

届边区参议会通过之边区施政纲领，亦在高议长之帮助督促下，得以贯彻实施。

该报同时还刊登了边区合作英雄刘建章在选举后说的话：

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里救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多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关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形，指导我办合作社的方针，他心里就是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适合了。

劳动英雄吴满有也说：

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

第二，1945年10月党中央虽然决定调高岗到东北工作，但当时还没有让高岗长期留在东北的安排。在9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办公厅在9月28日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西北局成员的通知中，还任命高岗等九人为西北局常委。是毛泽东于10月11日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才决定高岗等人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工作的，但也不是说到东北后就不再返回陕北。这从1946年3月27日刘少奇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

电报中说：

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2页。

既然是“暂时不必回延”，就意味着不是长期留东北，从而也就可以继续担任参议会议长了。

3 在大生产运动中

2000年9月16日的《北京晨报》，发了一条《南泥湾50年前开荒，50年后种树》的报道。

这篇并不惹人注目的报道写道：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九十华里处。过去方圆百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1940年，朱德总司令勘察后认为是个屯田的好地方，就将回防边区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绥德调往南泥湾开荒生产。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战士们仅用三年时间就使昔日的深山老林变成了丰衣足食的陕北好江南，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封锁。”

“然而向荒山要粮、战争以及管理等原因，使南泥湾在生态环境上欠了债，也使当地进入了‘越开垦越穷、越穷越开垦’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相信这条消息不会与事实不符，但在本书将要叙述的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开荒种地，陕甘宁边区的党、军队和老百姓，就将被困死、冻死、饿死。因为当时已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绝境。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2页。

这种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确实有些难以理解的举动，在当时确是必须的，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1942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蓬勃进行中就明确指出：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②

这样一场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且完全必要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

指挥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具体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民众大生产运动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高岗。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08—109 页。

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 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这次动员大会吹响了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亲任主任，并在各学校、机关、单位亦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高岗自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工作。从他这一年的主要活动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结束后，2 月 6 日至 8 日，高岗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了实施决定。

5 月 1 日，高岗陪同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说：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

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21 页。

7 月 12 日，高岗又与毛泽东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的口号。

11 月 15 日，高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1939 年和 1940 年，还是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和探索阶段。转入 1941 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陕甘宁边区也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但断绝了抗战初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少量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另一方面，边区的军政人数却急剧增加，不但国统区许多人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纷纷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也相继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而且为了保卫边区，边区的驻军迅速增加，以军队为主的脱产人员，从 1939 年的 4 9 万人增加到 1941 年的 7 3 万人，边区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才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并逐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

因此，从 1941 年起，大生产运动进入了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第二阶段，所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投身到生产劳动当中。毛泽东亲自下田种菜，朱德与他的

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荒地，周恩来曾被评为纺线能手……这些中共领袖们的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信心，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生产委员会的主任，高岗自然也要在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据 1944 年 2 月 2 日《解放日报》报道，在 1944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边区党民系统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岗曾经当众宣布过他自己的生产计划：

带领他的秘书、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种棉花两垧、洋芋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而且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

1943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进入了实现丰衣足食的最后阶段。经过边区军民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达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金色的秋季，丰收的季节，鲜花颂模范的时刻。

1943 年 11 月 26 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

200 余名劳动英雄和 3 万多名各界群众出席了大会。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民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

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高岗还总结说：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发明，许多创造，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些都是和劳动英雄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精神，把我们的丰衣足食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这次生产展览会共展出展品 6600 多件，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 1980 多张。这些活生生的事物与详细的图表表明，一年来，耕地面积扩大为 1338 万亩，粮食总产量 184 万石，棉花总产量 173 万斤，产盐 60 万驮。全边区的 33 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互助组的占四分之一，改造好 4500 个“二流子”，安置移民 8000 户，部队开荒

21 万亩，合作社发展到 255 处，国营工厂百余家，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

这次盛会还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 25 名、甲等 34 名、乙等 8 名。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 11 月 29 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做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 月 9 日，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吴满有、申长林等 17 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

16 日，两大盛会胜利闭幕。

这次英模大会和展览会是对大生产运动的最好总结，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硕果的普通劳动者们理应戴上英雄的桂冠。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高岗也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然而，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只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如果把百姓的拥戴看做是个人功劳的回报，把所有的桂冠都心安理得地戴在自己的头上，那将是摆不正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危险信号，势必留下严重的隐患。

12月5日，高岗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宴请全体劳动英雄。6日的《解放日报》对这次招待会做了如下的报道：

在昨天，英雄们又会见了时刻渴望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及以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缠着手巾儿，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挨饿受冻，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

招待会上，各分区的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了六面旗帜，每面旗帜都写上了颂扬高岗的词句：

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

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

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

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1943年高岗与夫人李力群及儿子、女儿在延安的合影

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献旗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高岗的讲话主要是赞美英雄们的业绩，称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圣人”，号召全体军民要向他们学习，并且告诫英雄们说：“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要天天打扫，不扫就要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英雄，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但高岗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英雄们给自己戴上的桂冠表示谦让。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

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页。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

“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4、5页。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

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

“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38 页。

我们没有找到高岗与林、谢二老直接争论的具体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双方肯定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辈，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泽东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决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关边区财经政策的大分歧，看来也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因此，这一期间，“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41 页。

从 1941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22 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 月 24 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 日上午，谢老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华

定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老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谢二老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二老：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上述内容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5页，但这封信的下面一段话《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第139页却予以完整的引用，现转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上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

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更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为了说服林、谢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说：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页。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页。，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②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高岗对陕甘宁边区的乡土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边区的经济工作也比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同时，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主管财经工作。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虽然没有高岗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材料，但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这份报告中，高岗首先论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然后分别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志丹、陇东、安塞、延长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如安定有一乡长与支书，有驴不去驮，引起群众反对，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认不对，还骂上级，这是顶坏的一个，要给以适当的处分。

报告认为，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

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而“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的。但高岗干工作确实有一抓到底的作风，往往直接处理基层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岗答复延安县干部关于运盐工作的一些疑问，以此作为各地运盐干部的工作参考。我们从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中，可见高岗工作作风之一斑。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除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地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将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条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地解决牲口，把必需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地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险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着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中央档案馆、陕

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316—318页。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至此，一场由“盐”引发的争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由盐引发的争论虽然结束了，但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加强。1942年9月，为了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维汉同志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弥补林、谢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维汉临行前，毛泽东找他长谈。毛泽东说：

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

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499 页。

从后来的实践看，李维汉的到来加强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政府与中央局的团结。陕甘宁边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根据地中，确实起到了“首都”的作用。

八 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概述

颇受争议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开了 88 天，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西北局高干会开得确实很顺利。

这次会议时间较长，内容丰富，所解决的问题也很重要。因此，西北局高干会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主要事件。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但由于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研究如何评价与高岗关系密切的西北局历史。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鲜有涉足的问题之一。

不过，作高岗传，西北局高干会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越翻阅历史材料越感到，这次高干会议不仅不应该回避，而且非常有必要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1 会议的由来

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是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在延安召开的。

此时，正是全党整风的关键阶段。

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从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发出整风动员令，到 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整风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延安整风历时四年之久，几乎是八年抗战的一半。

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要用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从上至下地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有的论著引用胡乔木的回忆，说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高新民等：《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448 页。

实际上整风的意义并非如此玄妙，毛泽东对彭德怀所说的“只有你才懂得而其他人不懂得”的“这个意义”，仅是指整风的意义之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给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0、188 页。

也就是在这本书中，胡乔木用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上述关于整风的疑问。他说：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③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

整风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整风两个阶段进行，而高级干部又是整风的主要对象，这在今天已经不难理解。可是，要理解为什么在全党整风阶段会召开一次长达 88 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则有必要从延安整风起于高级干部整风、经过全党整风后又终于高级干部整风的复杂过程讲起。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开始的。毛泽东从 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号召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是从 1941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的。

1941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高岗和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横跨九、十两月，但实际上只在 9 月 10 日、11 日、12 日、29 日和 10 月 22 日开了五次会。据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回忆：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 1932 年至 1935 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

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也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98 页。

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第一天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就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还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克服的办法，但不用说全党，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认识也是相当不一致的。

这也表明，想在此时就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毛泽东果断决定，要把整风运动推进到全党，“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为此，毛泽东首先采取了两项重大步骤：

一是高级干部先走一步。

9 月 26 日，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高级学习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的组长；

二是在理论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后亲自撰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系列文章和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虽然这两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毛泽东通过对集中体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已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为在全党肃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做好了理论准备。

在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全党整风阶段。

全党整风包括整风动员、思想整风和审查干部三个阶段。思想整风阶段又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而其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为什么西北局高干会议能够成为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第一，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毛泽东在1943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的发言。，但“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宗派主义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影响，在当时只剩下了西北根据地这一处例证。认真总结、深入剖析“左”倾冒险主义在西北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在全党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西北根据地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的重灾区。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各个根据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西北根据地仅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而不是受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的重灾区，那么，它在全党整风中也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党内斗争，西北根据地的曲折发展历史，恰好就是以王明为代表

的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左”倾错误即将葬送这片唯一的革命根据地时，中央红军的到来又使它绝处逢生，并且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在全党整风阶段，总结西北根据地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具有典型中的典型的特殊意义。

第三，抓住西北根据地这个典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统一认识，具有先行一步的示范效果。

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 3240 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搞好了，取得全党整风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北局的整风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才直接领导召开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也使这次长达 88 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2 会议的筹备

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形式而言，可以如某些论著所言，是一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但这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却有全党性的影响，对推进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和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召开的。

首先，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分别组织了两个考察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早在 1941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了西北中央局的书记和委员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然而，连毛泽东在 1941 年 5 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毫无影响”，如果没有 1941 年的“九月会议”，毛泽东都“不敢到中央党校去做整风报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第 1 版，第 289 页。所以，当时显然还不可能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因此，一直到“九月会议”后，高级干部的思想趋于一致，中央才决定召开一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来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和陕甘宁边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1941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然年过花甲，但仍然率领一支 20 多人的考察团赴富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区、乡基层的具体情况，为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做准备。

1942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20 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带领一支 30 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调查经济工作、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议做准备。考察团分成三个分团，高岗亲率第二分团深入到双湖峪、周家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形成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

该书通过生动翔实的材料和大量统计数字，详细介绍了绥、米两地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分配状况以及农村的阶级关系，1942 年在绥德、米脂调研工作时的高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整风动员和整顿学风的进行，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全党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42 年 4 月 10 日批准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总委员会下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及保安司令部、西北中央局及民众团体三个分委。

4 月 18 日，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了《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论述了整顿三风的重要意义，部署了总学习委员会制定的学习计划。

4 月 21 日，总学习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边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2000 多名干部出席了会议。任弼时首先在大会上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遵义会议以前，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现在它是党内“保存的残余”。整顿三风就是要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党更加巩固、团结，更有战斗力量。高岗在讲话中还说：在学习中，不是望文生义就算懂，而是要真正领会精神实质。要精读，要写笔记写心得写反省出墙报，帮助学习，要使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检查督促各单位的学习情况，4 月 27 日，总学习委员会决定，由西北中央局抽出七位同志组成巡视团，了解整风学习情况，吸取学习经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5 月 1 日，巡视团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审计处、教育厅、边区党校等单位巡视后，认为干部学习情绪很高，非党人士亦有很多人自愿参加，计划周密，纪律严明，好像正规学校一样。

为了促进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总学习委员会还作出关于单位互相参观的决定。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参观团互相观摩。

6 月 2 日，总学习委员会在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各单位学习委员及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200 多个学习小组的 400 余人以及各校的 300 余名学员参加了会议。高岗代表总学习委员会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当

前的学习热潮是空前的，但在学习中反省自己不够，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加强领导深入学习。然后，提出了七项具体的改进办法。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学习一直到 1942 年 9 月才大体结束。经过近五个月的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提高，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再次，党中央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精心部署。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工作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王稼祥负责军队编制工作；西北局高干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陕甘宁边区系统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于 10 月中旬召开，内容是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的。

中央作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决定后，9 月 1 日，西北局发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整风、统一党政军民领导、精兵简政、财政经济问题。要求县委、分委、特委、省委书记，党员县长、专员、副专员，团长、团政委及旅长、旅政委等全部参加会议。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问题。会议同意任弼时提出的关于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准备工作的通知。决定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讨论的各种决议草案，可先经会议讨论，于会议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再交高干会议最后通过。

至此，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胜利召开一次对推进全党整风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的各项条件已经齐备。

3 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不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14日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几次在讨论中插话发言。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在大会上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做了传达。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任弼时就几个问题的意见、林伯渠就简政整改问题、贺龙就整财问题、谭政就整军问题分别做了报告，朱德、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会议的最后两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作大会总结。

这次近三个月的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后，21日即由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用整风的精神来研究边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会主席团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转变为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阎红彦、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

年等边区老干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做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

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高岗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做了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有70多人在会上发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第二，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第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大会的最后一个多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

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

这次会议所讨论解决的三个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三万多字，分六个部分：

-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 （四）肃反事件；
- （五）肃反事件以后；
- （六）结论。

报告的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点结论：

（一）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报告认为，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建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是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二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农村为主；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国胜利；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否认客观事实，认为革命力量已占绝对优势，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革命武装的惟一正确的战术；第二，不了解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

再次，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军问题。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以及各种中上层

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的政策；第五，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相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荫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地拉拢，反之则严厉打击。

（二）“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报告认为，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是本地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

其次，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质

报告认为，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他们是一切从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他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

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地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把刘志丹同志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四）思想斗争问题

报告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以错误路线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达到打人之实；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报告认为，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地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从高岗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报告中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根源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论述，几乎就是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相关内容论述的翻版，与后来所召开的政治局1943年“九月会议”上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论述也基本相同，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词，也都大同小异。这表明，高岗在这次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经中央审议后同意的。

正因为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化”，才使这次会议成为在全党彻底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先声。

4 会议的一点不足

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也有其不足，主要是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过于追究个人品质问题，批评犯错误同志的语言、方式也过于偏激。

西北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朱理治、郭洪涛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确实是严重的。一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的老同志在高干会上言词比较激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错误是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如果对其简单地全盘否定，归结为品质的极端恶劣，不但不利于深刻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作为中央的决定，就更应该慎重。然而，不但高岗在报告中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也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

从会议记录可知，在大会讨论时，也出现了“大批判”的场面。朱、郭等人在大会检讨时，不但要经常回答代表们的各种不乏过分责难的提问，而且座中经常有人大声呼喊：“要老实回答！”

西北局高干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不足，反映出如何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比1941年的“九月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议，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

胡乔木认为：

这次会议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上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2、298页。

这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还是比较注重追究“左”倾错误路线的个人品质问题的，也曾出现了“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②。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认为，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一直到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在回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还坚持认为“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并且“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1944年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最后时期，也开始纠正此前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明、博古的错误

应视为党内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认识“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对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对陈独秀与反对李立三的斗争，那是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地讨论但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很显然，在一年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党对如何认识“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尚未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偏差，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对于会议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高岗是1945年11月来到东北黑土地的，此时的高岗刚满40岁。

按照孔夫子的理论，40岁是人的不惑之年。该懂得的已经懂得了，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也可以独立思索和解决了。

然而，共产党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活动的，形势发展的呼唤，组织上的安排，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黄土地上生活、战斗了40年的高岗可能事先并没有想到会来到寒冷的黑土地开创新的事业，但当这片黑土地成为国共两党谁主沉

浮的关键因素时，不但组织上需要高岗赶赴东北，高岗本人也挡不住这片黑土地的诱惑。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高岗在黄土地上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但他事业的巅峰，还是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

不过，世事难料，祸福相依。后来的事实还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未完待续）